

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

一

就像書名顯示的，這本新書的寫作，對我來說，也是一種思想操練。¹如此比喻，不是一時心血來潮，而是長期醞釀的結果。十三年前我出版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，在〈導言〉中提及「人類歷史上，有過許多『關鍵時刻』，其巨大的輻射力量，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」。「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，『五四』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。作為後來者，我們必須跟諸如『五四』（包括思想學說、文化潮流、政治運作等）這樣的關鍵時刻、關鍵人物、關鍵學說，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。這是一種必要的『思維操練』，也是走向『心靈成熟』的必由之路。」²這段話，我在作為新書打頭的同題文章中有所引述，且做了進一步的發揮：

* 本文初刊於《文藝爭鳴》，第9期（2018）；人大報刊複印資料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第12期（2018）轉載。

1 陳平原：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。

2 陳平原：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3。

我的基本立場是：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，但更迷戀複雜、喧囂卻生氣淋漓的「五四」新文化。我曾說過：「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、跟1968年的『五月風暴』對話，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『五四』等『關鍵時刻』對話。這個過程，可以訓練思想，積聚力量，培養歷史感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，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。」³在這個意義上，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，「五四」既非榜樣，也非毒藥，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「磨刀石」。⁴

不管是「思想操練」還是「磨刀石」，都只是比喻，且只可意會難以言傳。不過有一點，當我這麼表述的時候，與其說是對學界的要求，不如說是對自己的期待。實際上，我也正是在與五四的不斷對話中，逐漸提升自己的學問及精神境界。

1982年春，我開始在中山大學攻讀碩士學位，撰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即〈論白話文運動〉。為什麼學「中國現代文學」專業？因為77級大學生初入校門便躬逢思想解放運動，普遍認為自己的辦雜誌、寫文章、談國事等，是接著五四新文化人的。六十年一甲子，在精神上，1979是承接1919。為什麼從「白話文運動」入手，因不滿那時學界基於政治立場而對白話文運動主將胡適的刻意貶低，某種意義上，這也是在呼應現代

3 參見陳平原：〈走不出的五四？〉，《中華讀書報》，2009年4月15日。

4 陳平原：〈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「五四」〉，《探索與爭鳴》，第7期（2015），頁20-23。

文學界已經風生水起的「撥亂反正」。這兩點都很顯豁，過來人一眼就能看清。需要說明的是第三點，那時我正對美學感興趣，拒絕爭論〈文學改良芻議〉是不是形式主義。在我看來，形式不僅僅是技術問題，而是蘊涵著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以及一代人的審美感覺。因此，應該「不把文學形式看成單純的形式，而是看成積澱著豐富思想內涵的『有意味的形式』；不把文學形式革命看成單純的形式變更，而是看成整個社會價值標準和審美趣味的轉換」。⁵因剛剛入門，讀書不多，論述自然相當粗疏，但大思路還是可取的。而關注「有意味的形式」，日後甚至影響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及寫作。談論小說的「敘事模式」而非「思想內容」，從形式角度來闡釋晚清及五四的文學革命，算是我對中國學界的一點貢獻。⁶

其實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從此與「新文化」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唯一需要說明的是，我心目中的五四，不限於1919年，也不限於1917至1922年，我談五四，往往兼及晚清。在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的〈導言〉中，我談及為何「把梁啟超、吳趸人、林紓為代表的『新小說家』和魯迅、郁達夫、葉聖陶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論述，強調他們共同完成了中國小說

5 陳平原：〈論白話文運動〉，《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》，第3期（1982）；此文日後收入《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》（杭州：浙江文藝出版社，1987；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。

6 初刊於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1995年獲教育部頒發的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二等獎，2017年12月更獲得目前中國人文學界最重要的思勉原創獎（第四屆）。



吳趸人

敘事模式的轉變」。⁷十年後，在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》的〈導論〉中，我再次強調：「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『共謀』，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天地」。⁸而到了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，依舊主張談論「五四」必須兼及「晚清」，「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，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」。⁹如此學術立場，在中外學界，比較接近的是張灝先生。¹⁰

因主要關注晚清以降的思想、文化、文學、教育，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會涉及五四，但真正以五四為主角的，是以下三書：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、《「新文化」的崛起與流播》和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。略感遺憾的是，三書都是論文集，而不是起承轉合布局勻稱的專著。這裏沒有獨尊專著的意思，而是因中外學界關於五四的著作很多，我為了趨避而捨棄若干重要命題，不免有點可惜。

7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，頁30-31。

8 陳平原：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適之為中心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5。

9 陳平原：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，頁3。

10 參見陳平原：〈「新文化」如何「運動」——關於「兩代人的合力」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秋季號（2015）。

在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的英譯本序中，我提及：「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，不斷跟它對話，並非濫得虛名，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。必須承認，一代代讀者都與它對話，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；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，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。」但另一方面，我又表示擔憂：「過於熱鬧的『五四紀念』，誘使不同政治力量都來附庸風雅，導致『五四形象』誇張、扭曲、變形。」¹¹如此立說，不僅關注五四的實際內涵，更關注五四形象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、傳播與流變。也正因此，我的五四論述，不純然是史學研究，更包含思想辨析與現實論戰。

二

與研究唐詩宋詞或李白杜甫不同，談論五四的，不管左中右，都很容易與現實政治發生糾葛。北大百年校慶前後，我因將這所大學置於教育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的脈絡中考察，不能不牽涉其與五四運動千絲萬縷的聯繫。權威的《北京大學校史》將蔣夢麟校長推崇美國大學模式及其正規化教學思想，說成是為了配合國民黨的思想控制，我之表示不以為然，其邏輯起點是以教育而非黨派的立場來談論五四前後北大的得失。對於此

11 參見陳平原：《自序自跋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4），頁197-198。

文的批評雖不太公正，但態度還算溫和。¹²接下來可就不一樣了，真的是風雨滿樓。我和夏曉虹合作主編的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(1999)出版後，得到學界的普遍好評，1999年5月4日《中國圖書商報·書評週刊》用一整版的篇幅予以介紹，且摘錄了若干配有頭像的人物點評，其中恰好沒有李大釗。這本是報紙編排及讀者趣味的問題，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。但有心人四處告狀，害得我不得不捧著原書，翻開第72至80頁，讓領導明白我沒有刻意抹殺李大釗。可這不管用，該來的還是來了。當年影響頗大的《中流》雜誌1999年第5期上發表〈好一個「五四不吃香了，怎麼辦？」〉，連〈北大校慶：為何改期？〉(《讀書》，第3期〔1998〕)帶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一起批，說我的論述框架是「國內外敵對勢力夢寐以求的」，而「真正的共產黨員，是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」。¹³此文除了帽子特嚇人，還專門送達各有關部門，以致不只一位領導對我的「思想傾向」提出批評。好在北大校方大度，我的抗壓力也比較強，取消學術榮譽無所謂，只要能上課就行。也幸虧那時整個學術環境寬鬆，否則，這將可能成為一個年輕教授過不去的坎。

12 參見校史編者的〈就《北京大學校史》說幾句話——順答陳平原君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，第3期(1998)，以及陳平原：〈大學史的寫作及其他——兼答《北京大學校史》編者〉，《讀書》，第2期(2000)。

13 參見陳平原：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增訂版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5)中的〈「觸摸歷史」之後〉和〈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後記〉。

同年，北大主辦紀念五四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季羨林、湯一介出面邀請海外客人周策縱、唐德剛、林毓生、陳方正、龍應台，以及上海的王元化等，到西山大覺寺繼續座談。王先生的《九十年代日記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詳細記載此事，對北京學者的過於懶散不無遺憾：「原來想讓大家各抒己見的計劃也就成為泡影了。下午大家坐在院中看茶道，實際只是在那裏休息而已。」王先生有所不知，那天座談會還沒開始，有關方面緊急叫停，勒令我們立即下山。軟磨硬泡，加上拍胸脯打包票，對方攔下一句話：若場面失控，出現反動言論，你們負責。此前的北大會議，已經鬧出很大風波，主持者日後為此寫了不少檢討。我們真是不知厲害，以為只是平常的朋友聚會，加上遊山玩水。會議由我主持，先請性格溫和，講話不出格的湯一介、王元化多說，下午則乾脆改為品茗聊天。我知道有嘉賓不滿意，但也只能這樣了，誰讓我們談的是敏感的五四。¹⁴

又過了十年，2009年4月，我在北大主辦「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同樣一波三折。會議是正式呈報且獲得學校批准的，可會前十天，有關部門還是把我找去，詳細審查大半天，問能否取消，我說來不及了；再問出現問題誰負責，我當即立下軍令狀。因我心裏有數，請來的學者都通情達理，說話會有分寸。會議第一天沒問題，第二天下午的提問

14 參見陳平原：〈在學術與思想之間——王元化先生的「九十年代」〉，《書城》，第12期（2010）。